

# 名人自述

主 编 方健文 张 钊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13)

线装书局

# 名人自述

第十三册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 目 录

## 第十九编 文化大革命

### “文革”故事回忆

- |                        |      |       |
|------------------------|------|-------|
| 关于“二月逆流”和“杨余傅”事件 ..... | 聂荣臻  | (3)   |
| ‘文革’之忆 .....           | 徐向前  | (17)  |
| 终于汇入一场内乱之中 .....       | 肖劲光  | (44)  |
| ‘文革’沉浮 .....           | 黄克诚  | (53)  |
| 关于“七·二〇”事件的回忆 .....    | 陈再道  | (77)  |
| 十年内乱中的遭遇 .....         | 曾 生  | (108) |
|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      | 卜大华  | (114) |
| 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 .....   | 孙一先等 | (123) |

## 文化人话“文革”

- |               |     |       |
|---------------|-----|-------|
| “文革”时期的我      | 陈翰笙 | (131) |
|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 吴冷西 | (136) |
| “文革”杂记        | 萧乾  | (149) |
| 我的“七夕”        | 流沙河 | (162) |
| 丙午丁未纪事——乌云与金边 | 杨 绛 | (170) |
| 十年荒唐梦         | 叶浅予 | (202) |
| 我和皇帝溥仪        | 新凤霞 | (221) |
| “文革”与我的相声生涯   | 姜 昆 | (235) |

## “文革”怀人录

- |           |     |       |
|-----------|-----|-------|
| 我与朱德在“文革” | 康克清 | (255) |
| 我与闻天在“文革” | 刘 英 | (264) |
| 忆主席       | 章含之 | (278) |
| “四五”的天安门  | 水 静 | (285) |
| 在江西的日子里   | 毛 毛 | (289) |
| 彭德怀在“文革”  | 彭梅魁 | (300) |

## “四凶”末路

- |         |     |       |
|---------|-----|-------|
| 粉碎“四人帮” | 肖劲光 | (305) |
|---------|-----|-------|

- 
- “文革”结束前夜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 王守江 (311)  
风雷激荡的十月 ..... 范 硕 (312)

## 第二十编 改 革 开 放

### 思想解放之春

-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 邓小平 (339)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 邓小平 (341)  
结束两年徘徊局面的斗争 ..... 肖劲光 (352)  
各界人士谈思想解放 ..... (362)  
1978年的大争论 ..... 曾 涛 (369)  
邓小平的气魄大的令我心折 ..... 布热津斯基 (380)

# 文化大革命

---

这是一场革掉“文化”命的“大革命”，中西方的一切文化遗产统统在扫荡之列；这也是一场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革命领袖从此化为耸入云端的神灵。“红海洋”和“语录台”，“早请示，晚汇报”，加上“喷气式”、“牛棚”和“牛鬼蛇神”，“文革”百态不一而足，在今天已难以让人相信，可在那个岁月却是千真万确地在中国存在着。回首那个荒唐岁月，留下的只能是一把辛酸泪。

# □ □ “文革” 故事回忆

---

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毕竟是一场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许许多多的人都象断了线的风筝。

## □ 聂荣臻

### 关于“二月逆流”和“杨余傅”事件

#### 二 月 逆 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削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1967年2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

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 2 月 16 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 月 16 日下午，周恩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

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两个月以后的4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

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1968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们发动了总攻。

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

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被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囔囔，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 26 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

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 10 月 31 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

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事情很明显，林彪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阴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1968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

阴谋。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 “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

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1968年3月22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3月24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3月8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